



周兴陆 著

文論求實

复旦大学
古代文学研究书系

陈尚君 主编





周兴陆 著

文論求實

复旦大学
古代文学研究书系

陈尚君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论求实 / 周兴陆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0

(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书系)

ISBN 978-7-5325-9012-4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6102 号

封面题签: 周兴陆

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书系

文论求实

周兴陆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75 插页 5 字数 298,000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9012-4

I · 3322 定价: 8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2018 年上海文教结合“支持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
资助项目

自序

复旦大学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镇。我很有幸,在这里学习和工作,成为学科组的一员。趁此机会,我谈谈个人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几点体会。

首先,要理论与文献兼顾。空谈理论不行,仅仅做文献,也不是文学批评史。理论与文献并重,是这门学科奠基者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开创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初,郭先生一方面从事宋诗话辑佚、考证的工作,一方面用现代文学观念重新梳理传统文论;新中国成立后,他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在思考传统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等问题,兼顾理论与文献两个方面。我的老师黄霖先生80年代初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册,200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也是在理论和文献两方面下过苦功夫,做出大成绩的。我们应该把这个传统保持下去。虚的问题要做实,实的问题要做虚。意思就是,提出和阐发“虚”的理论观念,要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和现象分析上;文献考证本身不是目的,应从具体的文献考辨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问题。举一个例子,明末清初许多反清、抗清、与清人不合作的文人,他们的别集在晚清时期被刊刻出版,现在影印本一般依据的是晚清的刊刻本。我仔细对勘过彭士望、王翊别集的刻本与存世的稿抄本,发现晚清的刊刻本有大量的删削和改动,把那些政治性强的、有违碍字眼的诗文都删改了。这就不只是哪个本子更可靠的文献学问题,而是与清代的文治和文学批评有关的一个理论话题。以文献为基础,归结点还是在理论。

其次,读古人的书,思考今人的问题。文学批评史既是一门历史学

科,更是一门理论学科。从历史学科的角度说,它本身有许多课题,需要像研究文学史那样去探究;从理论学科的角度说,研究批评史不能只埋头读古书,还须抬眼关注当代社会的问题。过去周作人从批评史上提炼出“载道派”和“言志派”的对立来概括中国文学史,从学理上说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紧盯当前,用意在为“言志派”个性主义文学开辟道路。郭绍虞用“纯文学”“杂文学”观念的消长来梳理批评史,也不无可议之处,但对于提倡纯文学观念则是不无意义的。思考当前问题,过去曾出现过失误,如文学理论上现实主义,研究批评史就说白居易是现实主义,这种“以古证今”的思维模式今天还很普遍。我觉得传统的意义不在于证明今天已存在的东西,而是提供可以弥补今天缺失的、纠正今天失误的东西。西医治不了的病,用中医来治。比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理(动词)性情”、“诗可以群”、“德”与“言”、“教化”、“讽刺”、“变化气质”、“自然”等观念,对于纠正当前文化的一些不良现象,还是有意义的。应该从矫正和批判当代社会不良文化现象、思考文化发展方向的立场来研究传统的文学批评史问题,这样文学批评史才是有力量的。

当前人们匍匐在物欲之下,成为欲望的俘虏,常患得患失,没有自信,没有定见。“物”与“我”的问题其实一直贯穿整个中国文化史,儒家、道家、佛家从不同角度解决二者的矛盾。“物”与“我”也是文学批评史的一个基本问题。“感物兴情”说,喜柔条于芳春,悲落叶于劲秋,人没定见,是不自由的。中唐至宋代出现了“不感物”“超感物”的诗学心理机制。苏轼说“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黄庭坚说“决定不是物,方名大丈夫”,强调的是诗人的超越性人格,“我”终于战胜了“物”,成为超越世俗的、自由无碍的主体,这是宋诗背后挺立的主体性人格。我前几年出了一本《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诗学卷》,花费很多笔墨谈中唐至宋代这种超越性的人格精神,视之为中国人精神发展的新层次。其实在下笔的时候,更多思考的是当前的社会问题。在今天我们需要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决定不是物,方名大丈夫”的超越性人格精神来对抗噬人的物欲。又如对“人性”问题的思考,过去人们一讲到文学中的“人性”,马上想到袁枚。但我对袁枚“性灵说”的认识是,在诗学发展史上,它表现

为与传统诗教的分离,与格调诗学的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方向,即诗歌的个性化方向。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依然十分坚固的思想堡垒中,这种新的思想动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扭曲的。清代中期的社会还没有给予个人真情以充分舒展的空间,还没有新的曙光来照亮诗人的心灵,因此这时所谓的性灵、真情、个性化,只是在个人一己的私情俗欲上放荡,表现出颓废的色调。尽管这种世俗化是对正统理学思想的反叛和嘲弄,但它本身是带有先天不足的。如果沿着其庸俗性的一面发展,将会是人性的堕落、艺术的堕落。在《古诗讲读》里,我特地引出袁枚《马嵬》:“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说“最爱言情之作”的袁枚,能将笔触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表现他们的真情,这是清代“性灵”文学的进步。袁枚诗中所咏对今天的文坛依然无不针砭意义。

第三,读世界的书,思考中国的问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当然是要把我们自己的文史哲书籍读好,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说的是要不要读外国书,如何读外国书。自一百多年前门户开放后,国人没有不受外国思想影响的。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学无新旧”,有深厚的中学基础,更有利于吸收西学;有了一定的西学视野,可更深刻地认识中学的特点。今天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多读一点外国书,总是有帮助的。但是,切忌把在国外特定的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文学命题上升为文学的“基本原理”,用来阐释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这种“以西律中”的方法曾经很流行,造成了严重的失误。如曾有人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有的人就说《诗经》中的《生民》是史诗。过去说“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生活”,这是基本原理,但是在刘勰《文心雕龙》里没有发现“形象”,于是或贬斥《文心雕龙》没有认识到文学的本质,或对《文心雕龙》加以曲解以比附。又如20世纪初的研究者把欧美17、18世纪出现的“纯文学”观念引入中国,感叹中国是“杂文学”、“大文学”观,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纯文学”,其实西方古代的文学观念也是很庞杂的,雄辩术什么的都是文学,“纯文学”的产生非常晚。钱钟书先生提出“参酌人我,辨别异同”,这应该是对待外国文化应有的态度。朱自清先生曾受“新批评”科学主义精神的影响,

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努力要把中国文论的范畴解释清楚,撰著了《诗言志辨》,是一部经典著作。但“新批评”把作品当作独立的“文本”,切断它与作者、读者的联系,这个原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杜甫的诗歌,如果不联系杜甫其人、其时代,那是解释不清楚的,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不因“新批评”的引入而失效。古人说:“同而不同处有辨。”今天对待中外文论,也要做这种辨析,不能再把外国的理论当作裁判官,把自己的祖先当作阶下囚。

海外汉学也是外国的书,读时应区别对待。海外汉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余英时、杜维明、王德威等先生,既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又具有国际化的视野,着眼点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他们的著作更能给人以启发。现在搞文史的,大约多多少少都受到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的一点影响。另一类人,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法新奇,多禁不起推敲。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在传播中国文化上作出的贡献,但不应该把他们奉若神明,抬高他们的学术,仰其鼻息,尊为范式。举一个例子来说:潘岳的悼亡诗非常有名,但是现存文献关于他与妻子杨容姬婚姻的记载是有矛盾的。日本学者兴膳宏先生《潘岳年谱稿》较早注意到这个矛盾,提出疑问。国内学者顺着兴膳宏的疑问,说潘岳再婚了,凭空猜测,毫无文献根据。人家提个疑问,打个问号,我们就把它坐实,划上了句号。我们这种跟着人家跑的学风,实在是要不得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屈原否定论”在20世纪闹得沸沸扬扬几十年。70年代,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存在,大陆学者捍卫屈原的存在,争执不下。其实,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存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显然有自己的政治用心。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做论文,以引用外国文献为自豪,转弯抹角绕到某些大汉学家头上。在他自己认为这是炫博,其实正暴露出自己的幼稚。英国学生研究莎士比亚,难道会频频征引陆谷孙教授的《莎士比亚研究十讲》,引以为荣吗?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那就是我们的大悲剧。研究中华传统文化,需要有自主意识。对于外来学说——不论是东洋还是西洋的,都要多加检视,不能盲目相信。一百年前,三十余岁的黄人撰著《中国文学史》,旨在熄灭国人“厌家鸡爱野鹜之

风”。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文史学者来说,这个任务依然很艰巨,很迫切。

第四,多读前面的书,研究后面的问题。这一点主要是就我个人说的,不具有普遍性。六朝以前的研究,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出现,不大可能有重大的创获,研究者应该注重传承,而不是一味地求创新。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今天研究的人很多,如果能把刘勰提到的作家作品认认真真地读透,把《文心雕龙》文本钻研透彻,在研究中把它传承下去,就是很了不起的,不能抱着一鸣惊人的心理去琢磨实现大的突破。明清时期不一样,有大量的材料没有人去整理研究,有很多空白点,需要人去垦荒。所以做学位论文在明清时期很容易找到题目。但是研究明清时段,不能眼睛只盯着明清,应该系统地阅读先秦汉魏以降的书,前面的基础越牢靠,对后面的认识越真切深刻。如明代的诗话,大量地论述前代的诗歌,如果不读前人诗歌,或者读得少,明代诗话就读不透。翻看清人的文集,多是讨论经、子、史的问题,如果没有对前面上古、中古时期知识的相应储备,清代的别集就读不下去。像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那真正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为张先生小学、史学功底好。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以上四个方面,是我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所取的路径。这条道路实在漫长,我只能说是尚在起步而已。古人说:“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我把自己的“路头”说出来,就是希望得到行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免得路头差了,误入歧途。

2011年,我曾将此前的论文结集为《诗歌评点与理论研究》,作为庆祝我的老师黄霖先生七秩华诞文丛之一种,由凤凰出版社推出。现在这本集子收录的是自2011年以来公开发表的28篇学术论文,主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及文献研究,因此取名曰《文论求实》。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陈尚君主任要推出一套学术文丛,承蒙不弃,将这本集子纳入其中,我心存感激!拙稿是否会拉下这套学术文丛的整体质量,我又是诚惶诚恐的。其中一定存在许多不足和不当,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这些论文曾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光明日报》《文汇报》

《文艺理论研究》《复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明清小说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编辑老师都给予我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激!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黄亚卓女史为抽稿费心费力!我只能以更勤奋的工作来回报大家的关爱。

2017年6月30日写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目 录


自序	1
中国文学的渊与源	1
从汉代宾客之盛衰谈班固《答宾戏》之主旨	4
“潘岳两次婚姻说”辨疑	18
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德”论	27
刘勰论鸿都门学发微	38
《文心雕龙·通变》辨正	51
《文心雕龙》析疑三例	62
五言是“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吗?	72
《钱本草》非唐代张说所作	77
从宋钞本考察《诗话总龟》的早期形态	81
吴澂《送何太虚北游序》本事钩沉	86
白居易与明代吴中诗坛	95
冯复京《说诗补遗》浅论	104
彭士望的诗集、诗论与诗作	120
吴应箕《甲乙遗诗》考	133
从《王介人集》论王翊诗歌	141
少年记忆与《秋柳》诗之微旨	154
关于金和诗歌的两种文献 ——兼论冯桂芬对金和的影响	165
叶昌炽《辛白稼诗臆》流传、批注和索隐	175

“小说改良会”考探	199
新发现梁启超致张元济等尺牍十七通	214
胡怀琛的“新派诗”理论	220
从新发现的散佚诗稿解读晚年的杨圻	242
“文笔论”之重释与近现代纯杂文学论	257
文道关系论之古今演变	277
俞平伯早年的《中国小说史讲授纲要》	293
洪业《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出版的前前后后	308
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	
——略谈传统文论的精神内涵与现代意义	318

中国文学的渊与源

201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刊载了刘毓庆、徐志啸两位先生关于“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什么”的对话，是难得一见的真正的学术争鸣，读来很有兴味，颇受启发。真理越辩越明，可能我们离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不远了。

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答案并非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关键是对“源”这个比喻词的理解，两位先生在无意之中存在了分歧。源的初文为,意为泉水从山崖渗出。从这个意义出发，把中国文学比喻为一条水流，它的源头应该是很细小微弱，如所谓的滥觞，只能浮起个小酒杯。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一》说：“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谓发源滥觞者也。”“源”字引申为开头、起始。徐志啸先生说：“中国古代神话是很丰富的，神话是西方文学的源头，而中国文学的源头可能不仅仅是神话，还有口头文学。”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追溯中国文学的源头的。

与“源”相关的一个字是“渊”，通常联合组词“渊源”。刘毓庆先生在争论时说：“就像河流，我们说它是源头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水渊’，六经就是中国文学的水渊。”这是用另外一个比喻词“渊”代替“源”了。渊的本字为,像深潭有水之形。刘毓庆先生就是从这个意义，即深渊的意义上，指出六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的。

其实两位先生并不在一个意义层面上探索中国文学的“源头”，各有其合理之处，都能够从历史中寻找依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中国文学批评上，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兼容了二家的看法。刘勰专立《宗经》篇，提出各种文体都是发端于经典，经典为后世文章确立了原则（“文

能宗经,体有六义”。)经典对后世文章的沾溉与影响,“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特别是刘勰在《宗经》篇末说:“渊哉铄乎,群言之祖。”这正是刘毓庆先生所谓“六经就是中国文学的水渊”的直接依据。但是刘勰所谓的“宗经”不是说后世的文学滥觞于经典。

刘勰在《原道》篇里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把人类文明追溯到浑沌初开时期,说得有点儿神秘。又说:“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所谓的“声采靡追”,就近乎徐志啸先生所谓的神话之前人类尚未开化的阶段。刘勰在《明诗》篇里追溯最早的诗歌是《吕氏春秋》记载的“葛天乐辞”,《通变》篇追溯最早的“咏歌”是《吴越春秋》记载的黄帝时《弹歌》。刘勰在《时序》篇里把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帝王世纪》和《列子》分别记载的唐尧时的《击壤歌》《康衢谣》,显然这些文献都是逸出“六经”之外的,正是徐志啸先生所谓的口头文学和神话。南朝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也可以作为徐说的旁证。因此我说刘、徐二先生的观点在古代文学批评史文献中都可以找到依据,特别是同时都糅合在刘勰《文心雕龙》中,因为在古人那里是并不矛盾的。

我这样讲,并非是说现在这场争论没有意义。恰恰相反,这场争鸣,不只是具体的学术观点的辨析,更是当前文史研究的学术理念之争,反映出当前学术范式的某种转向。传统文学史上,“宗经”观念发生很大的影响,经典滋润并规范着后世的各体文学。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经典的权威性遭到质疑和否定,经典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地消解了。事实虽然存在,但是存而不议。因此,今天方铭、刘毓庆先生重新提出这个话题,强调中国文学的一个本然的特征,当然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当前“国学热”的背景下。

文学起源于神话,这是一个西方式的命题,与进化论相结合,百余年前传到中国并运用于对中国文学史的阐释。今天对诸如此类“以西释中”的模式进行检省,也是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个命题之所以能贯彻到中国文学史的阐释中,说明它与传统文学并非毫无契合度。国人正是在这个理论的启发下,努力发掘过去被斥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神话传

说。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地结合中国自己的文论传统对这些搬来的命题加以修正、改造和重释,正如黄霖先生所说,要“从世界性中抓住特殊点”,“从多元性中找出融合点”,而不是轻易地把20世纪里从西方借鉴而来的命题范畴抛弃了事。其实有些范畴命题抛弃也是抛弃不了的。比如“中国文学”一词,现在我们把诗、词、文、小说、戏曲纳入一个系统,在一本书里叙述。而在中国传统里,这五者从来就没有在一本书、一个系统里出现过。目录书里小说与诗文归入不同门类;一个作家即使兼备各体,但其文集也不会通通把它们包罗进去。如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就不收《儒林外史》。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学”,是依据现代的文学观念回溯传统,把传统里符合现代所谓“中国文学”内涵外延的成分挑剔出来?还是按照《论语》中那个“文学”的概念的自然发展来框定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呢?依前者去做,有问题;依后者去做,有困难。正确的途径可能还是二者兼顾。归根到底是,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欧洲文学的同与异。过去强调的是趋同,甚至丧失自我地趋同,当然是失误;今天多强调的是别异,当然很重要,但如果否定各国文学存在共同性、相通性而执拗地别异,可能也会产生失误。文史研究的“去西方化”如何更理性、更稳健,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载2015年10月29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从汉代宾客之盛衰谈班固 《答宾戏》之主旨

《答宾戏》是班固的一篇重要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曰：“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①萧统《文选》“设论”类收录了该文。

对于班固《答宾戏》的主旨，龚克昌先生阐释说：“作者通过宾主之问答，力图揭示无功、有功的分别，在于弘道与否，以此说明自己不汲汲于富贵功名，笃志于为文著述，无怨无悔的心志。”^②周启成先生等解说：“班固才盖当世，而章帝雅好文章，因而班固颇得宠信。章帝每有巡狩，就献上赋颂；朝廷每有大议，就使质难公卿。但官运不通，位不过郎。有感于东方朔、扬雄怀才不遇而作《答客难》《解嘲》，因而模仿他们而作此文。”^③这两种解释之间实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的解释侧重于说明笃志为文、无怨无悔的心志；后者则谓主旨是模仿东方朔、扬雄，抒写怀才不遇之感。这都是本于《答宾戏》前的小序，但未能作全面深入的理解，故而出现了偏差。

《答宾戏》前的短序曰：“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④这段文字又见于班固的《汉书·叙传》，是作者的自序，当为可信。关键是对它如何解释。龚克昌先生抓住的是序中“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

①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55页。

② 龚克昌：《全汉赋评注·后汉》，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

③ 周启成等：《新译昭明文选》，三民书局2014年，第2233页。按，周先生的解释是依据《后汉书·班固传》。

④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15页。

一句；周启成先生则着重在“感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一句。若反复推敲全文，可知该文主旨其实是在于“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对于“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班固是明确否定的，故而作此文“折之以正道”，表明“君子之所守”，也即为什么他能“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正确理解班固《答宾戏》的关键有二：一、班固《答宾戏》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之间是什么关系？班固是否与东方朔、扬雄有同样之“感”？二、对于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宾客游士，班固是什么态度？是否感慨不遭其时？

一、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到班固《答宾戏》

班固《答宾戏》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之间存在文本的“互文性”，《答宾戏》中主人对宾的回答，也可以理解是对东方朔、扬雄的回答。

东方朔在武帝时上书陈述农桑耕战、富国强本之策，而不见用，因此作《答客难》以发牢骚。开篇客以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身居卿相之位以诘难。东方朔“喟然长息，仰而应之”，回答的要点是此一时彼一时，时异世改，不可同日而语；若苏秦、张仪生活于当今之世，也是无能为力，所以应该修身自得，等待时机。若遇到时机，他也会像乐毅、李斯、酈食其“说行如流，曲从如环”^①。如果说东方朔感慨遭遇了天下太平、四海一家的盛世而没有纵横驰骋的机会的话，那么扬雄则是遭逢哀帝之时，丁明、傅晏等外戚与佞幸董贤结党营私，卖官鬻爵，他只能全身远害，淡泊自守，以至落拓不振。扬雄在《解嘲》中极力渲染仕途的危险，“一跌将赤吾之族”，“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②，“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高危”，正是对哀帝时黑暗政治的揭露。此时“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近师”，士处于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003页。

^②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006、2009、2010页。